

柯尔施政治思想的发展

吉恩·恩里科·罗斯科尼 著

崔媛媛¹, 唐 塘², 刘林娟³ 译

(1.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2.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3.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崔媛媛 校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通过重读柯尔施的著作及信件, 追溯了其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柯尔施一直在批判和反思马克思主义, 并从无产阶级行动的角度找到理论与实践的关联。他坚持在工人自治运动中寻求民主解放的可能, 并用革命与反革命、政治与经济的对立来表达政治矛盾。他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假设, 并尝试背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方法去重塑他理想中的“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 柯尔施; 政治愿景; 工人自治运动; 无产阶级; 雅各宾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182 (2016) 05-0027-10

DOI:10.13624/j.cnki.jgupss.2016.05.004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 流亡到伦敦的柯尔施在写给其朋友兼信徒保罗·帕特斯 (Paul Partos) 的信中称自己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具有批判性而不拘泥于教条。”只要稍微触及一点自恋意向, 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会这样定义自己。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柯尔施这里, 有一股不妥协的、彻底、锐利的精神气质或态度使得他成为了一个从上到下彻底颠覆正统的人。(这种态度源于一种政治的、理智的和学术的孤立生活,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对他的“再发现”要为一系列解释上的含糊不清负责, 这些含糊不清只有到现在才能澄清。)这种态度使他不仅“在革命的理论后退到纯粹的意识形态时去抗议意识形态对机会主义实践的掩盖”, 而且以极度的严苛来判断工人阶级的政治错误(事实的和假定的)。在柯尔施看来,

“自主的无产阶级行动”这一概念不证自明: 它是通过对历史错误的否定来定义的。当无产阶级行动时, 它就成了历史的构成主体。这种自主行动的缺失或失败与作为一种整体现实的“反革命”是相一致的。

这就是柯尔施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 它决定了经济与政治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问题化的原因不在于这种关系是抽象意义上的, 而是作为工人阶级及其对手(不管被称作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反革命)的经济或政治行动。从柯尔施批判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这个观点来看, 他的整个理论论证必须被重新评估。接下来要从重新理解柯尔施的著作开始, 这必须面向批判的唯一本质标准: 其自身的政治意图。

柯尔施对德国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论贡献在于, 他尝试在这一意识形态内部找到某些东

[收稿日期] 2016-05-16

[译校者简介] 崔媛媛 (1983-), 女, 安徽桐城人, 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硕士; 唐塘 (1983-), 男, 安徽泾县人, 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刘林娟 (1988-), 女, 安徽安庆人,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西，以能够表述被同时代发展推动的行动需要。事实上在柯尔施那里，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工人运动的悲剧和连续错误与失败可被理解成对它的关于真实的革命“行动”的实践政治（或是其政党与联盟机构的实践）的缺失和持续衰败。只有在这种理解之后，才会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工人运动理论的不足的控诉。

以下是体现了柯尔施政治思想演进的一个基础的、悬而未决的东西：随着委员会政治经验的丰富，他从一个原初的费边主义者（Fabian）和社会民主立场转向了列宁主义的“正统”阶段。随后，他卷入第三国际内部或反第三国际的争论并最终转向极左阵营，这一转变预示了他的成熟，或至少可以说达到了他观点上不可更改的地步。

对于不能接受其政治立场的人而言，柯尔施的政治著作甚至也具有纪实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持续渗透到20世纪后半叶的德国和欧洲工人运动的政治历史中的极端主义者，他的政治思想给我们提供了历史地再审视的机会。

与从1923-1924年左右柯尔施开始浮现出的反革命概念（也就是对他政治思想发展的第一次强烈谴责开始）不同的是，自主的无产阶级行动是从他开始关注战前工会运动时就在场的。我们已经在别处分析了柯尔施关于委员会运动的理论与政治的解析。此处我们将仅概述一下他尝试分析1923年的关键经历时使用的理论和政治框架或结构——一种在之前十年间发展起来的框架。

在柯尔施看来，1918-1919年间无产阶级行动的自发扩张存在致命缺陷，它无法从根本上被有效组织起来。因此，他对列宁主义的转向是通过寻找一个有效率的政治组织来实现的。他从未信奉“纯粹的”委员会概念；他从未分享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幻想；实际上，他的脑海中总保有一种思想，即在自我管理方面，现代经济中的大众在多大程度上没有做好准备。然而针对列宁主义，柯尔施最先增加了一个独特论点：他以革命的工会组织主义的非正统视野看待理论和实践运动。大众为寻求社会主义的自发运动也陷入工会组织主义的影响之中——随挣脱“权力征服”这一传统框架而来的是对生产的直接挪用和管理的需求，在传统框架基础上，社会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的正统说法已经停滞了几十年。柯尔施在那时写到，在社会主

义中任何一种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手段都不能被无产阶级的自发行动所取代。1920年他认为列宁主义有能力调和民众的“经济的”自发性和“政治”效力之间的关系，这是有征兆的。民主苏维埃的集中制组织能够调和工人的自我管理愿望与技术生产必要性的关系。

就具体掌握他们的困难和矛盾而言，对列宁主义与苏维埃的这种抽象参照还远远不够。此外，在柯尔施的全部理论中似乎没有一个政治概念能够说明列宁主义者选择的意义。民众的“经济”行动与“政治”间的对立构成了一个被冲淡了的、实用主义的政治观，这一观点被简单地等同于来自上层的法律措施和制度决策的复杂性。“经济”概念也含糊不清：一方面它似乎表明了社会结构的整体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被经济制度决定；另一方面，经济制度本身倾向于被特定地等同于不同时期的劳动（Arbeitsverfassung）观。柯尔施在1922年的《工厂委员会的劳动立法》中列出了一个新的劳动“章程”，即无产阶级必须在反资产阶级斗争中去表达和定义概念。无产阶级因此要提出一种不同的连接政治与经济的方式，同时也使其与由资产阶级提出、并被社会民主党接受的概念对立起来。

即使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战略性地使用立法的欲望消失之后，这个计划仍然存在。事实上，在柯尔施的经济概念中，关于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部分地遵循过渡的新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与工人从根本上控制、管理和改变这些规律的必要性观点同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经济的”转变使工人行动的“政治”主旨合法化。“十月德国”事件引起了柯尔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停顿”。柯尔施在1924年2月28日于图林根州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讲中讨论了这次失败（看到了由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构成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的工人政府在受命于共和国总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埃伯特的军队干预面前被迫解体）的动因和后果。

正如此次会议的速记报告记录的那样，柯尔施就在萨克森州、图林根州与希特勒企图武装夺权的巴伐利亚出现的事件和不同的处理方法做了对比。浮出水面的是巴伐利亚的“法西斯主义”轮廓，其中希特勒与他的同伙在“合法的”当局的计划中仅扮演一个下级的和偶然发生的角色。与柏林的国家法西斯主义计划相

比，撒克逊人“无产阶级百夫长”（主要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假定的“恐怖分子”行动仅是使中央德国的工人政府尴尬的一个借口。这被看作是由军队首领冯·斯科特（von Seeckt）率领的“国家”法西斯主义确立的第一步。从柯尔施的话语中，对于直接体现为资本主义民主和“法西斯主义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已形成了一整套理论。糅合这些论证和意义重大的矛盾后我们发现，在社会民主党本身不想和不知道如何去执行其民主职责时、去维护共和政体合法性的论点（沿着1922年3月反对卡普暴动的工人行动路线）。柯尔施继续写道：“我不否认共产党员不只有追求捍卫与巴伐利亚法西斯主义相对立的民主这一目标。（‘啊哈！’来自右派的赫夫塔打断说，‘这同时也是委员会共和的一个创造’）。我们的历史目标在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对于面对我们的敌人，对于诸如包括短期内继续使用内战的法西斯主义的攻击，我们也以内战回应。用暴力对抗暴力。”^{[1]132}他解释道，如果共产主义者们没有失去对最终目标的洞察力，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愚蠢地期望或渴望一场即刻的叛乱，比如一场枪战（无论怎样，正如希特勒的某亲信认为的那样）。共产党员们认识到眼下无产阶级处于持续的威胁之下，必须被允许不仅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而且要通过军事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

在1923年10月的直接进攻与1924年2月柯尔施演讲之时的新的“合法”境况之间，仅是法西斯主义的形式而非实质发生了改变。事实上，只有“法西斯主义”能够将德国从1923年的完全崩溃（鲁尔区的占领、恶性通货膨胀、被包围的持久状态）中挽救出来——不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而是埃伯特与冯·斯科特的合法法西斯主义，是关于超级生产与废除八小时工作制的政治法西斯主义，是宣布共产党不合法与普遍镇压革命工人阶级的法西斯主义。如果形势在镇压之后突然好转，这并非源于“民主”的奇迹；恰恰相反，其表明了德国已被放置在隐匿于民主形式下的法西斯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环境中了。^{[1]138}

柯尔施不顾地方议员、特别是那些社会民主党人日益增长的急躁情绪，继续严酷抨击社会民主党人自身，称他们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一部分”。“以选择较轻的罪恶为借口，社会

民主党人已支持了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治的所有恶行，并已在一种对抗无产阶级本身的罪恶方式下提升和使用了他们。”^{[1]141}然而，我们不能在没有重建他关于1923年10月到11月的社会民主党人活动的分析——一个注定落后于关于1918年十一月革命事件的分析——的基础上、继续停留在这些被柯尔施耐心忍受的不敬攻击上了。其中，注明柯尔施对社会民主政治的不懈责难以及他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完全和不可逆转的法西斯主义化的论点很重要。这些观点在经验领域扩大，并先于对纳粹极权主义更离经叛道的表达意识之前（此外，正如对苏联内部反革命的谴责并未预见到斯大林主义的倒退）。这些是植根于作者的精神进程中的政治评估，它们渗透并严格挑选每一段可能的深入体验。

对柯尔施而言，法西斯主义和反革命不是政治和社会学上有限的和可限制的现象：它们是对工人失败的准确回应。“真正的”法西斯主义是以工人为代价的经济稳定化——尤其是通过八小时工作日的废除。1923年10月至11月的事件缓和了工人的自治问题，不再是在政治真空（如1918-1919年），而是在资本反攻同时存在的意义上缓和的。然而，这一切不能改变工人运动的发生和本质。以在图林根州委员会里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猛烈申诉为结尾，柯尔施做了一个启发性的声明：“没有一个政党——甚至共产党也不行——能够神奇地创造出对抗资本的斗争……一个政党可以摧毁障碍，可以做出掠夺性的工作（例如通过摧毁工人仍有的关于民主与社会民主特性的幻想），但这些斗争自身只能从经济状况中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说，在德国这肯定会自然必然地出现在不久的将来。”^{[1]159}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年柯尔施对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敌意，我们将禁不住高赞他的卢森堡主义倾向。但事实上，委员会遗产是积极且具启发意义的。令人感兴趣的是从“经济状况”自发产生的斗争的“自然必然性”要求。因此，我们可以将经济的客观性视野与对阶级主观行动的期望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的缺失将会导致反革命。这种直接联系第一次澄清了革命行动与机会主义操作的区别，并最终推导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论点：对苏联内部社会主义建设的谴责是对资本主义的复辟，并因此成为反革命的举动。

随着与官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工人运动获得了新的主题含义。1927年5月1日我们已经在反对派杂志《共产主义政治》（*Kommunistische Politik*）中读到了关于作为“无产阶级构成”因素的工会经济斗争这一概念的重要改造。柯尔施在工会行动方面的持续兴趣并不局限于革命工会主义（例如，他为德国人工业团体—德意志工业联合会—的杂志工作）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工会间的对立。对工会行为的分析引入了对于“辩证法”的更加普遍的争论；根据辩证法的规律，自治形式与生产力的发展（工会的最初含义）是紧随生产力本身而改变的。在这一特定情况下，柯尔施主要关注德国民主社会党工会—通过同盟的法律义务—试图代表所有工人和使革命工会非法化的垄断倾向。经过精确论证，柯尔施显示了改良派工会如何通过将自身活动局限于经济领域而陷入一系列的形式和实质矛盾之中。最重要的是，改良派工会由于机关斗争而沦为国家镇压机器的一部分。柯尔施谴责工人阶级的社团主义（*corporativization*）。他们因为相信国家机器在法律上能确保他们拥有某些权利的幻想而牺牲了自主权（他们忘记了这些权利只能通过斗争来获得）。柯尔施在魏玛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苏联俄国都看到了这一点。这种过度简化抹去了对三国不同情况的具体判断，也因此破坏了比较它们的任何合理可能性。这种极端主义仅仅在把无产阶级标识为“生产力大军”（因此作为任何工业体系中一个稳定、客观的元素）、并假设其是与现有经济对立的自主政治主体时才有可能成立。在无产阶级仅作为一个经济元素存在的地区（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在法西斯资本主义、在斯大林主义政党专政的国家），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反革命将不可避免地支配政治局面。

然而这是有趣的完全抽象的逻辑建构，因为它没有调查分析无产阶级现实，而只是在假设。柯尔施以凭借“自由”的某种形式被转化成“新的阻碍和自由的缺乏”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的抽象而结束，这不是偶然。这种“辩证法”在“自由”和“国家”的对比中达到顶点。^{[21]44}

在柯尔施这一阶段的著作中（1930年《反批判》时期），自由的概念不是民主和自由的版本。甚至当他谈到个体言论自由或反政党独裁

的群体言论自由时，他也总将自由看作为革命激进主义的一个选择。“自由”是对每一个反革命联盟和最终对国家的否定。从这个角度看，柯尔施是如何看到通过各种国家或“民主”的链接、“法西斯”或“苏维埃”的准国家组织（建立起）的反对工人自由的反革命圈子就很显然了。

这里有必要简要考虑在柯尔施的理论和政治历史上已扮演了相当重要角色的“俄国问题”。在他的列宁主义理论阶段，柯尔施不能绕过关于俄国因从“战时共产主义”崛起而被争论的矛盾。但他将它们看作“辩证”解决方案已经存在的矛盾。然而更紧迫的是本文作者在回顾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的书籍时遇到的棘手问题—即西欧共产党人提及的他们看作为“列宁主义创始人”的俄国共产党人的杰出角色的方式。这是极易引起争论的话题，不应停滞在如此脆弱的口头妥协中。

1925年以来，柯尔施不得不面对一系列聚集起来可能产生爆炸性效果的事实。预示着快速发展时期的所谓的德国和欧洲经济社会的“稳定”随着1929年危机戛然而止。这次危机恰好与苏维埃国家对以内部政治平衡为基础来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相一致。这里的内部政治平衡特指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对于很多人而言，这种平衡看上去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的”。派系和人格斗争只是俄国政治框架内的一个变数而已；这一框架在当时和现在被错误地抬高至致力于新体系客观动态决议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地位。共产国际内部冲突的实质就在于对这一系列事实的解释和政治回应。

尽管柯尔施提出派系斗争是客观利益冲突的直接体现，但他依然强调派系斗争。获胜的派系（布哈林、斯大林）被认为是在代表苏维埃国家利益的声音前、首先代表“俄国人民”利益的声音。细读柯尔施的杂志《共产主义政治》，我们对以下事实印象深刻，即：尽管日期、信息和社会-经济的考量因素频繁出现，讨论的中心依然是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等的意识形态上的指控。正当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具体历史时机出现时，对正统信仰的自相矛盾的依赖也出现了。“俄国问题”将柯尔施推向焦点：他要么接受俄国活动作为新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并认识到无产阶级集体行动的缺席，从而赞同俄国执政党和几乎国家垄断式的

政治角色；要么他必须在意识形态上訴诸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拒绝和谴责这些事实。这是他永远摆脱不了的一个矛盾。

尽管有这些缺陷，柯尔施对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观点的批判性分析或拒绝将苏维埃政府看作“世界劳工运动的全部”（而是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并未失去力量。诸如论述“托洛茨基问题”的一些文章甚至预测了他后来几年的政治雅各宾主义。

但上述评论不适应于柯尔施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稳定性”解释成一种“机会主义”创造的解读。乍一看，我们很难理解柯尔施和其他人为何否认了1924年以来的魏玛共和国经济和政治稳定的证据（柯尔施多年后在其历史回溯著作中欣然承认了这个事实）。极左派归咎于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高失业率、（经济）相对薄弱、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低。但这不是柯尔施的兴趣所在。此处的逻辑分析应上升到更高的层面：在灾难性的世界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稳定只是资本的一种政治反攻。

这种极政治化的阅读因其最终的政治意义而舍弃了对经济数据的具体考量。一个看到经济中崩溃的客观必然性和资产阶级政治中仅存的胁迫和压制行动的计不允许无产阶级提出具体且现实的策略，而仅仅是革命行动的抽象必然性。现在缺少的是在与法西斯主义和后来新政有关的自由民主框架内对资本主义经济机构具体发展的分析。因此，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在自身构成上没有可供参考的具体观点。劳工们面临两难抉择：去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对柯尔施而言这是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选择）；或者一在工人自我管理的直接行动的缺席下（这一点将在革命的西班牙部分地出现）一成为现有经济和国家的完全对立面：“任何因生产方式以现有方式存在而作为参考的人不仅在逻辑上必须放弃无产阶级革命而转投资本主义改革，而且最终向法西斯主义投降。”这段引文的背景—1935年对美国工人党纲领的批判—可能更有说服力，但殊途同归。

柯尔施20世纪30年代初的政治愿景是如此的不切实际，以致希特勒的掌权和纳粹独裁的快速巩固都没有像震惊很多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使他震惊。仿佛这一切都不完全是真实的一包括他现在遭受的迫害。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特点都被吸收至将法西

斯主义看作划时代现象的总体判断中。然而，他完成了对《劳工构建的新秩序》一书的批判性解析，此书由荷兰共产国际党人在1933年出版。在1930至1933年期间，柯尔施试图将自己的极左立场与官方的共产党立场区分开来。他认为共产主义者在纳粹主义的结局上愚弄自己（纳粹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而紧随资本主义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很大程度上就像马克思在法国的波拿巴反革命时期问题上愚弄自己一样。根据马克思的名言，巴黎公社的“真实秘密”在于工人阶级政府的存在，它是“由反剥削阶级的生产者的阶级斗争产生的，也是劳工经济解放可以出现的并被最终发现的形式”。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都以类似的方式在革命的俄国的委员会体制中看到了巴黎公社的延续和社会主义的实现。

面对“苏维埃共和国”名和实的公然对立，柯尔施没有满足于指责其“背叛”和“变质”。我们有必要去理解这个历史辩证法，并通过将其延伸到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观点中去解释它。通过此辩证法，生产力和革命运动发展的每一个形式反转为开放的链条。此外，公社形式是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发明：它是资产阶级构成自己阶级的时刻。马克思不期待独立于自身阶级内容之外的公社构成的政治形式的任何奇迹般结果。正是公社“形式”本身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阶级功能的变化。

柯尔施在其关于公社的第二篇文章中宣称马克思学说中对于解放工人运动“最终发现的政治形式”的欣喜和这一政治形式的不确定性及模糊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如果说这一点在历史上是不容置疑的，即只有公社经验使马克思相信必须要摧毁而不是接管被建构力量的现存结构（正如1864年他在国际劳工协会“就职演说”中表达的），那么下面这一点也是真实的：即他“反对将诸如巴黎公社的国家宣传为无产阶级独裁的政治形式”。1871年马克思对国际协会“总理事会的演说”没有被看作是对事件的客观独立评价，而是其为使马克思主义与巴黎公社相互关联所写的文字。在无政府主义和联邦党人的论战中，马克思被迫去直接或间接地强调公社那些与其本质不一致的中央集权特征，以及强调仅仅形式上的差异（工作人员回忆说：军事的、行政和立法权力的统一）。因此产生了巨大的混乱，这不仅关系到对巴黎公社历史

意义的正确理解，也关系到关于“委员会”国家的立场和期望。存在可避免国家镇压性质的“宪法形式”的错误论断被创造出来。柯尔施同样拒绝了列宁主义的、由“大多数反对自己统治者的人们”组成的国家已开始自我灭绝的论断。柯尔施在这一点上没有妥协：直到无阶级社会的出现，过渡时期政府（不管是改良主义者幻想的没有经过彻底变革就被征服的过渡政府，还是列宁主义者渴望已久的新政府）将和资产阶级政府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不是通过其政治形式（实现的），而仅仅通过其阶级内含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功能（实现）。正如我们在另一篇同时期文章中读到的：“只要无产阶级需要一个政府（即，为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革命时期服务的政府），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国家在政治形式上依然是资产阶级国家。”^{[2]144}

某种程度上，人们被禁止对未来社会的政治结构做出任何积极的预测，并小心翼翼地避开对无产阶级创造自发性的任何强调，柯尔施不能超越对过去革命政治形式的受时间束缚的反思。因此，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矩阵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资产阶级形式还是或多或少地被暗中作为范本模型。

柯尔施通过两个途径得出这一论点：第一是理论层面，通过反思总结出马克思-黑格尔的关系是对唯心主义辩证法范畴和概念的“传送”（唯心主义辩证法随资产阶级革命一同诞生，后被纳入对最初的无产阶级标准作出回应的理论框架）。第二是从法国大革命时期联邦党人与统一论者的历史辩论中更加精确地概述出“雅各宾”的个别特征。

如果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是资产阶级反抗敌对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那么联邦党主义原则是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自动克服这一观点则是错误的。

历史告诉我们联邦主义原则在何种程度上是倒退的。普鲁东等的联邦主义革命党人为在中央集权制中保留革命的内容而不得不抛弃这种偏见，这不是偶然。另一个典型错误是想当然地把最终呈现的国家类型作为评估革命及其意义的标准。相反，柯尔施坚持认为将“革命运动”和由此产生的“实质结果”间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才是必要的。这是寄生于革命中的真正矛盾，而不是像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坚称的、

仅仅存在于政治和经济间的矛盾。这个观点并不是与雅各宾的资产阶级国家理念相对立，而是它的有益补充。事实上，相当一部分法国和欧洲社会主义将其视为是1793年宪法的“社会和经济补充”，似乎这只不过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拓展一种在政治层面上建立的民主问题。马克思和列宁打破了这个传统，并申明了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必要性，“但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雅各宾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本质差别仍存在于其目的、功能和管理者中，简言之也即存在于它的经济和社会本质中，而不是在它的政治形式的任何差异上。”^{[2]139}

柯尔施并不想提出一种不同于马克思和列宁式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新版本：他只想对其本质加以警醒。并且，推翻旧国家的需要已在大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进程中被充分指出；这种革命是由西耶斯、布里索、罗伯斯庇尔、圣-茹斯以及1792年巴黎公社运动中的无名领导者开展的。但这些远远不够。马克思的作为“有组织的和集权化的社会暴力”的国家观被资产阶级用来对抗无产阶级，但也被无产阶级在某种不同意义上用来对抗它自身的敌人；这个概念以政治形态上“无阶级”的国家存在为先决条件。这里，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理念再次出现，在集会（the Convention）的一场著名演说中、当他提及“未出鞘的匕首在暗杀者手中和在自由主义的英雄手中一样焕发光芒”时表达了这个理念。这种国家体现了革命本身的矛盾。然而，不同于资产阶级教义，这种矛盾并不能在革命和反革命的政党间获得，同样也不可在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经济和政治间获得。相反，“它只能在革命本身内在固有的运动中，以一种自觉的、积极的和主观的方式被获得。”^{[2]143} 尽管如此，柯尔施仍坚持用这两种方式来表达这种政治矛盾：即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关于这方面，他在1935年对美国工人党纲领的批评值得探究。

柯尔施赞扬该纲领的两个方面，一是拒绝被明显带有半法西斯主义元素的新政所迷惑；二是否定工人委员会创立的支持“工人”国家的美国政治理念，而上述理念被认为是解决资本主义体制冲突、并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迈进的民主工具。他指出，美国工人党（AWP）的经济观点认为现存的危机—即使暂时得到解决—仍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开始。但他同时指出

美国工人党在积极评价苏联和“新社会”的计划经济时，未能对“计划经济”的理念及其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特征进行认真分析。该纲领最终成为片面攻击的推动者，而没有成为一个“对资本总体的革命性攻击”。

尽管柯尔施的批评方法受到正统流行体系的负面引导，他仍然提出了一些关于经济学的有趣观点。他通过谴责资本主义体制主要矛盾的方式指出了该纲领的基本问题。具体而言，这种谴责指出了潜在地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生产机器”和阻碍这种满足的“社会关系系统”的矛盾。对他而言，这意味着对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一种叛离，而后者被直译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冲突。通过把“分配”矛盾归因于资本家管理不善，即节约“生产”——该纲领忘记了后者是资本主义“分配”的绝对基础。它忘记了在当前模式和劳动力分工下工人和机器是一体的，而失业大军是此机制的决定性功能之一。接受当前的生产方式不仅意味着拒绝革命，也意味着对法西斯主义的屈服。事实上，只有“强大的国家”能应对不受管束的市场竞争和工人反抗引发的危机。这个国家有能力去反对工人及个体资本家和组织，从而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大多数的工人阶层和无业者都接受这一观点，即使正遭受法西斯磨难的小资产阶级也没有异议。

当然，这个对反革命国家的潜在流行共识的延伸和发展并未引起柯尔施的兴趣。由于工人阶级的存在——“最大的生产力”，他主要关注这个国家的不连续性。然而，这不能为基础工业中工人普遍命名提供完全精确的规定。

对致力于工会行动的那部分纲领的考察为所谓政治高于经济的讨论提供了更新机会，柯尔施宣称这次讨论的最好结果是实现革命的雅各宾转向（列宁），最坏则是激进的资产阶级转

向（社会民主党）。美国工人党在其纲领中重复这一错误方式，是将包括工会在内的所有“群众组织”完全屈从于政党的政治行动，而工会关于其他组织形式的特有品质没有被认识到。

遵循这一逻辑，德国和欧洲经验对于非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和使命而言成了一个消极榜样。被列宁主义和工联主义片面强调的经济和政治的克服与综合只能在有效的革命行动中实现。这是若干年后西班牙要学习的经验教训，即使柯尔施不得不责备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CNT）和伊比利亚无效政府主义联盟（FAI）犯了相反的错误：在革命行动中低估了政治契机。

更重要的是，与美国世界的相遇是从以精确社会科学发展为希望开始的。不幸的是这种相遇却没有结果，即使从政治和学术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在柯尔施写给朋友帕特斯的信中我们读到：“在我看来，很不幸的是，我无力完成这个国家中的任何事情。这次错误源于我自己对现实行为的懒散和厌恶，这是你熟识的、我现在比我在德国和欧洲流亡时期更糟糕的特点。”^{[3]218} 这些微妙的心理自我诠释只道出了柯尔施的部分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自我挫败感源于一种基于现已封闭的经验世界并被迫卷入自我批评的压抑漩涡的理论框架。绝非偶然的是，在几星期后的一封信中，我们发现他明确表达了介绍他在美国流亡期间的主题的一篇文章。^①我们读到：“过去所有形式意义上的整个工人运动实际上仅仅为资本主义的内部前进做好了准备，虽然它被‘法西斯主义’带入了一种反革命形式，但这一点已被世界范围内所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发展和证实。”在世界性的反革命迹象下，历史已经停滞。然而事实是柯尔施自己的讨论停滞了。反抗纳粹主义的战争远远没有开启新视角，而仅是“即使不是

① 我们自然不会忘记1934至1938年间，柯尔施全身心投入的主要事件之一是起草著作《卡尔马克思》。这是一本独特的著作，因为“受教育的资产阶级公众”（正如他在1935年5月10日给马蒂克信中描述的那样）也有意将他引入美国的学术界。然而在这点上柯尔施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他无意以机会主义的理由放弃他的任何“革命”立场（拒绝公开批评马克思，就像当时他在激进左派刊物所做的那样，就是这种态度的标志）。另一方面，他对美国社会科学的关注是真实的，并且也是与他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倾向相一致的。他特别培养了与心理学朋友库尔特·卢因的合作（他们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卢因在其编辑的丛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一合作的成果是1939年在第五届“科学的统一”国际会议上的报告。柯尔施也频繁地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接触，特别是在流亡国外时与皮洛克和霍克海默的接触。与后者的接触似乎目标在于合著一部关于“辩证法”的书（可能是《启蒙辩证法》）。但这一项目从未按计划进行。柯尔施与其他机构和美国大学也保持联系，但除了简短的合作和资金支持，他并未完全被学术界接纳。他被认为是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使他受宠若惊，也是他的学术障碍之一。

全世界、也是欧洲法西斯主义化深入的一大步。”这是他这些年著作里重复出现的主题。20世纪20年代的逻辑模式令人懊恼地被再现，包括工人对抗行动的假设。同时被再现的还有矛盾，或至少是严重的怀疑。他一方面确信“战争的秘密”在于总体化，它创造了“统一工人因此也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权力的前提。然而另一方面，他回想起资产阶级战争总会以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结束，因此无产阶级斗争必须等到资产阶级战争结束。在致力于讨论苏联内部反革命的背景下，他毫不犹豫地思索了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反斯大林的群众暴动”。

在1950年，柯尔施写的几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已经没有了任何政治立场，这是如何从他对马克思的反思中发展过来的，这一问题最值得关注。其中，他写给保罗·帕特斯的信很关键。在1935年4月26日（来自伦敦）的一封信中我们读到，在他看来，“今天不可能对明天的行动做积极的预测。”一个理论工作者自然总是尝试做与实际相关的预测，就像索雷尔（Sorel）几十年前做的那样。但索雷尔仍关注工人运动（即使在衰退）以及还未被摧毁的资产阶级传统。在今天这种情形下，尤其在美国，所有的事情并不依赖于“主观”，而是依赖于最粗陋的经济主义意义上的危机过程。在四年后的另一封信中（1939年7月26-29日）我们看到一种更明确的政治描述：“在美国，这里所有的事情仍然是史前意义的，并必定是重大而激进的史前史。它们没有交汇点。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做和说错误的、不可思议的事，如果他不想被包围且不想有限制地参与到西绪福斯式（Sisyphus）的工作中。然而在这种方式下，他可以艰难地去避免诱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工人阶级的斗争。这同样适用于革命的工会工作。如果某人想反对封闭的商店或其他‘法西斯主义元素’，或甚至是仅仅与反工人的官僚政治的恶劣堕落和畸形做斗争，他将不可避免地反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卖命。”^{[3]255}

在总结命运多舛的西班牙内战、谈到西班牙“工人抵制”的机会时，柯尔施重申了其对于欧洲的消极判断：“你（帕特斯）提出反抗组织在西班牙有更多机会，而不是在德国或意大利，这一点着实有趣。但我认为短时间内一切将仅仅重蹈被悲惨绞杀的覆辙。伟大的革命精力、勇气和西班牙工人全神贯注地避免每一次失误

是不够的。在欧洲层面的关系没有被深刻改变之前，最好不去做任何努力。”^{[3]218}

在随后的一封信中（1939年7月），柯尔施试图解释工人失败的更普遍原因“我相信有可能从以下事实中挖掘出过去二十年‘革命者职责的不成功的实现方式’，这个事实是：他们希望并且不得不去尝试一条代表了不仅仅简单地、理想化地‘完成’共产主义政党的道路。在他看来，唯一有效的历史贡献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做出的，但你很清楚那是多么短暂而痛苦的。”^{[3]226}

在信中与这些历史的和政治的评论相伴随的是更加普遍的理论思考。柯尔施对于帕特斯在新资本主义看到的“新政治形式”的陈述回应道：“为什么只是‘政治的’？在我看来，‘经济学’似乎总是成为所有政治形式中的主要和主导因素。‘工人阶级成熟的和革命的反思意识的诞生’不是我勾勒的未来图景的一部分（这一图景自然不比你的更清晰或更完整）；今天，我们不得不在三种清晰但无疑是错误、陈旧的观点和对不久未来的迷茫中做出选择。”^{[3]222}

比起“徒弟”帕特斯的愿景，“老师”柯尔施的则更加悲观。但这并未阻止柯尔施站在支持马克思主义、其方法和世界观的立场上，而这些与帕特斯过于毁灭性和负面的批判完全相反。之前写于柯尔施写作《卡尔·马克思》期间的一封信（1935年11月25日）所包含的忏悔和论述对于我们理解柯尔施整个思想发展的节奏意义重大：“如你所知，在我信仰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说期间，我总是宣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革命内核是它的‘批判’，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身的批判性解体……然而在1932-1933年冬季我最后的课上，我稍稍改变了这一视角。我已经揭示这种与《资本论》的主要经济内容相对的批判贡献是多么的无力，批判的观点发展地如此缓慢，甚至关于古典经济学的真正批判只能在马克思编辑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才能找到踪迹。而由恩格斯和考茨基编写编辑的手稿（《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则表明，马克思只不过是庸俗经济学的批判者，同时也表明，在货币、收入等细节上，马克思事实上仍是古典经济学的忠实弟子和追随者。尽管如此，我依然将马克思对待政治的实际和理论立场作为我区分马克思主义中‘活着的和已经死去的东西’的出发点。在马克思政治学

的资产阶级性质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性解体之间存在一种联系，后者将发展为一门直接社会化的科学，因此也将发展为一种直接革命性的实践。”^{[31]160-161}柯尔施继续说，在1848-1849年事件中，马克思试图通过法国共产党和蒲鲁东来阐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这时马克思表现得像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他忽略了“工人阶级和工人组织的自治要求。”即使在后来几年，虽然马克思接受了布朗基派的概念和口号，但他却是在纯粹“政治”意义上强调革命无产阶级的目标的。理论的转折是：“马克思显然很好地发展了经济范畴的历史批判（索雷尔对这一理论的挑战过于极端），但他‘克服’经济学而直接进入社会科学的宣言还仅停留在抽象层面，并未真正实现。这是在那些常被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革命意思的镇静剂而自由引用的线索之外的，这些线索以相当粗暴的方式（例如，以政治为中心的经济学；暴力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力量）显示了对‘正规’科学探讨的对立维持。即使在这里理论也呼应了实践：政党和工会的‘经济’斗争通过革命政党的政治引导而融合成一个整体。从历史特征而言，可以说通过经济学和指出‘财产’政治性质实现的政治斗争激进化是真正的雅各宾派。”^{[31]161-162}

这两段如此重要（对于批判地重新解读《卡尔·马克思》也同样重要），就不在此全文引用了。通过解读马克思，我们也因此可能得出柯尔施政治观点的积极内容（仅仅是“可能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它们离现实化很远）。

马克思政治立场的雅各宾矩阵被归咎于对资产阶级科学的经济范畴的过早理论批判以及由此导致的尝试发展一门“直接社会学科”的失败。这门学科与无产阶级意义上的革命社会实践相一致。1848-1849年，马克思舍弃了继续发展这门学科，当时所有一切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动力之下，而“经济”内容和斗争都以一种雅各宾派的方式从属于“政治”斗争。

革命爆发之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提出新工人运动的理论和政治基础，但为什么马克思却牺牲了工人自治呢？马克思为什么会为了以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概念和反俄国的“革命斗争”等为基础的同时乌托邦式的神话而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纲领（当然是乌托邦式的）呢？除了影响深远的雅各宾遗产，柯尔施未给出任何解释。而雅各宾思想继承了

对随工人运动失败而必将出现的“反革命”的意义和维度的误解。在题为《马克思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地位》一文中，我们读到：“波拿巴和俾斯麦的反革命政治将被解读为对之前革命进展的简单延续，根据这一点，该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已获得资产阶级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认同——它当然不是最差的文章之一。”这一暧昧立场先是体现在马克思与拉萨尔（Lassalle）、后来是马克思与李卜克内希（Liebknecht）以及拉塞尔与施韦泽（Schweitzer）的辩论中。事实上，施韦泽与拉塞尔试图通过反革命中潜在的革命可能性与反革命力量达成战术联盟。马克思承认某种妥协的进步特征，这一点是由与反资产阶级的工人的对立方赋予了，在他看来，工人政党不应以任何方式与对立方谈判自己的自治权。

但即使有以上所有的这些批评，对柯尔施而言马克思依然是一个积极参照，不仅因为他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和拉萨尔每一次战术“联盟”的敌人（这与1922年做出的判断直接相关），更重要的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仍具说服力。虽然批判了作为政治家的马克思，但在给帕特斯的信中柯尔施写道：“考虑到所有必然的改变，尽管与最初的资本主义很不一样，现在和未来的资本主义依然是‘资本主义’，所以我们依然可以将这种真正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

因此，我们再次面临正统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验教训的对立，而后者在柯尔施的复杂评价中扮演的角色如果不是互相矛盾的，也至少是模棱两可的。从这个观点来看，提供一种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条提纲》（1950年）的仔细阐释是可能的。在柯尔施思想发展的背景之外，这些提纲宣布了一种彻底相对化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它们是对前面概括的复杂问题的极端表述。如果这些提纲被看作是柯尔施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表述，那么他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手稿中有很多内容则无法理解；（例如在其1952年的手稿中，就积极评价了列宁的资本主义“不平等发展”的观点。）而他最后岁月的“梦想”也将无法理解。他在给罗斯·费舍尔（Ruth Fischer）的信中提到这个“梦想”，后又在1956年12月给埃里希·格拉赫（Erich Gerlach）的信中重复了这一点：“我总是被自己

的梦吸引：那就是，在理论上重塑那些明显被马克思 - 列宁 - 斯大林阶段的结论所破坏的‘马克思的观点’。”

“重塑”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它是重新创造发达工业社会的革命活动的政治理论，这种理论以“有计划地干预目前被排除的所有阶级的经济结构”为目标。它也是与历史马克思主义遗产联系起来的唯一道路；而这种遗产是从古典的、魏玛社会民主党和列宁主义 - 斯大林主义中总结出来的。柯尔施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垄断式”伪装，并将其看作是为了理解和指导无产阶级行动而被历史编纂出来的。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看，后者比历史马克思主义更为全面，因为它是根据特殊的、不可重复的经验伪造出的。虽然存在着矛

盾和悖论，但柯尔施的尝试在于将这一论点发展到极致，不是通过得出另一种理论和政治话语，而是通过即使有必要反对马克思的情况下仍忠实于“马克思的观点”。

参考文献

- [1]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Sitzungen des III[R]. Landtags von Thüringen, Vol. I [E], Weimar, n.d.
- [2] Karl Korsch. Das Problem Staatseinheit-Federalismus in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J].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XV, 1930.
- [3] C. Pozzoli(ed.), M. Buckmiller and Gotz Langkau(collected). Korsch' Selections[C]. Jahrbuch—Arbeiterbewegung. Theorie und Geschichte, Vol. 2, Frankfurt am Main, 1974.

(责任编辑：胡春燕，肖德生)